

民盟英烈

第一集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

宣传部
文史委员会 编

新平知
好學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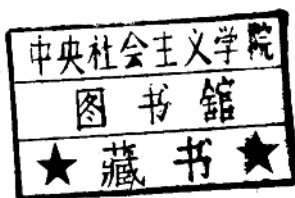
民盟英烈

第一集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 宣 传 部
文 史 委 员 会



200143567



1988·北京

01/29/01

編 者 的 話

《民盟英烈》第一集是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宣传部和文史委员会共同编辑的。本集介绍的是部分盟员英烈为争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英勇奋斗的壮烈事迹。他们艰苦奋斗、勇于献身的精神，是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财富。我们感到，学习前辈盟员的革命史，对于正在致力于振兴中华、统一祖国的广大盟员来说，将从中获得不少教益。

以下各集将陆续编辑出版。欢迎盟内同志踊跃供稿，并对本集的缺点乃至错误不吝赐教。

民盟中央宣传部
民盟中央文史委员会
一九八八年六月

目 录

我的父亲李公朴·····	张国男 (1)
人民的鼓手 民主的斗士	
——介绍聞一多烈士·····	刘 煜 (18)
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杜斌丞·····	马文瑞 刘澜波 王炳南
	孔从洲 常黎夫 (42)
大无畏的老战士	
——介绍楊伯恺烈士·····	郑暢 (56)
老英雄于渊烈士·····	王宗力 (71)
“双枪老太婆”	
——邓惠中烈士·····	楊玉忠 (77)
《紅岩》中成崗	
——陈然烈士·····	任锦霞 编写 (97)
一代英豪	
——刘国钰烈士·····	印兴娣 编写 (121)
怀念黃細亚烈士·····	林志成 (143)
战斗不息的老革命	
——王干青烈士·····	郑暢 (158)
何雪松烈士传·····	冯开文 (168)
蔡梦慰烈士传·····	邓又萍 (184)
程谦谋烈士传·····	譚重威 程济志 (199)

碧血膏黄土

——周从化烈士……………楊玉忠 编写（209）

钻进“铁扇公主”肚里的“孙悟空”

——黄子万烈士……………宋艳娟 李詩峰 编写（231）

爱国民主人士王伯高……………王廷全（246）

碧血染将天地紅

——毛英才烈士……………楊玉忠 郭培德 编写（258）

革命青年张大成……………张大昌（285）



我的父亲

李公朴

张国男

我的父亲李公朴牺牲于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二日。新中国成立以后，每年七月，中国民主同盟都举行仪式纪念他。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这种纪念仪式停了十年之久，那时我们只有在心里默念。今年春节，我收到香港出版的“三联书店成立三十周年纪念集”一册，父亲作为读书出版会的创办人受到广大读者的怀念。四月初，我有机会和我的爱人去了一趟昆明——这是父亲和闻一多伯伯一起战斗、牺牲的地方。我们和昆明阔别已整整三十三年了，那时我不过十五岁。旧地重游，又是清明佳节，我们特地到父亲和闻伯伯的墓前（衣冠冢）扫墓。墓地一直保护得良好，每逢清明不少人前往悼念。在昆明的那些日子里，我们拜访了父亲的老朋友们，大家回忆起父亲的生平和战斗的事迹。香港和云南朋友们的怀念，促使我立下一个心愿，要把父亲战斗的一生写出来，特别是从我对父亲的第一个记忆开始，到他离开我们那一天——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六年，我们整整相处十年间，我亲自所睹父亲怀着一颗赤诚的爱国心，为

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为了国家的和平、民主、统一战斗了一生，直至他流尽了最后的一滴血。我要写出来，以此作为我对父亲的永久纪念。

一九〇二年，父亲出生在常州的一个贫苦的家庭里。父母早亡，他兄弟四人，我父亲是最小的一个，从小由比他大十多岁的三哥抚养。因生活所迫，十三岁时就离开了私塾，到镇江一家京广洋货店去做学徒，给老板跑腿、做饭、倒马桶，一学就是三年半。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的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小小的镇江城也沸腾起来了。父亲同店里的一些青年组织爱国团，因反对贩卖日货，参加五四运动而被老板赶出来。后来到武昌中学念书，又因反对外国教师虐待同学而被开除。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他参加国民党，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战斗。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了，他亲眼看到蒋介石屠杀共产党员和广大人民，鲜血染红了黄浦江头，父亲愤然离开国民党，考取了留美奖学金。在美国大学里，他一面工作，一面读书，他亲身体验了美国劳动人民的生活。父亲回国以后，祖国的东北三省版图易色，三千万同胞沦作亡国奴。父亲和广大爱国知识分子一样，在苦闷、徬徨中寻求抗日救亡的道路。一九三二年，他在上海和邹韬奋等筹办《生活日报》，创办《申报》流通图书馆、《申报》业余补习学校和妇女夜校（《申报》总经理史量才于一九三四年被蒋介石暗杀，父亲为纪念他而将图书馆、补习学校改名为量才流通图书馆、量才业余补习学校）。一九三四年，父亲和艾思奇一起编辑《读书生活》半月刊、成立读书生活出版社（后改为读书出版社），想在文化教育事业中，宣传抗日救国。

同时，他同爱国的朋友们组织救亡团体，从事救亡运动。一九三六年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父亲被推选为负责人之一。

一 七君子事件

一九三六年，我们家住在上海。我父亲是个爽朗、乐观、非常喜爱孩子的人。我从小在他的身边长大，他很喜爱我和弟弟，但我们却整天看不到他。我对他的第一个记忆就是他被捕的那天深夜。当时的情景是我出生以来第一个可怕的印象，所以深刻地留在我的脑海里，永生不能磨灭。

我愉快地渡过了五周岁的生日。上海的十一月底已经有点秋意了。二十二日深夜里，我已经睡熟，突然被吵闹声惊醒。睁开眼，满屋都是陌生人。有的是国民党的警察，有的是法租界的巡捕，气势汹汹，蛮横无理。父亲正在和他们争辩，后来听父亲说了一声“我跟你们走”，他什么也没有拿就走了。接着窗外一阵汽车马达声，很快就消失了。街上和家里一片寂静，寂静得像坟墓一样。母亲坐在沙发上沉默无语，但面色苍白，含着愤怒。我有些怕，不知会发生什么不幸。我胆怯地问母亲：“爸爸到哪里去了？”“因为你爸爸爱国”母亲像是答复我，又像是在问别人：“爱国也犯罪吗？！”

提到“爱国”两字，中国儿童受到启发教育是最早的。我知道父亲为什么给我这个女孩子起名叫“国男”，那是因为“九·一八”事变发生不久我出生的，为“国家多难”，“难”与“男”谐音而起名“国男”，也希望我像男儿一样将来为国效命。弟弟叫“李国友”，“友”字是“为国担忧”的“忧”字谐音。这是要我们牢牢记着国家多难多忧。

一个多月了，天天盼着父亲回来，但消息渺茫。有一

天，母亲很高兴地告诉我，爸爸很想你们，明天带你们去苏州看爸爸去。我高兴地跳起来，我是多么想看到爸爸啊！

到了苏州，我记得我们是在一所军警林立、戒备禁严的大衙门前停住了，那就是吴县横街江苏高等法院的看守所。在门口盘查了半天才走进去，曲曲弯弯走进一个大庭院，庭院的一边是一排平房，出乎意料的是平房的前面站满了欢笑的人群。这一天是会见亲友的日子，所以显得很热闹。我一到大庭院，心就宽舒多了，解除了各种畏惧。突然爸爸从人群里跑出来，笑嘻嘻地跑到我们面前，抱抱我，抱抱弟弟，亲着我们，问我们这个那个。我感觉到脸上扎扎的，发现爸爸没有剃胡须。以后才知道，就从那时起爸爸留起胡须来，当时他不过三十五、六岁。

父亲和我们姊弟亲爱了一阵，又去招呼朋友去了。多少伯伯、叔叔、阿姨跑到我们面前，称赞父亲精明能干，安慰我们不要担心。他们说全国人民都在支援爱国者，愿作他们的后盾。一个阿姨带着我们去看各方送来的慰问品，水果、糖果、罐头、饼干满满地摊了几个桌子。这时一个长长胡须老人走过来，慈祥地抚摸我的头，问我想不想爸爸？他告诉我们，他们生活得很好，团结得很好，夸奖爸爸爱说爱笑爱唱歌，大家选他作“事务部主任”，那些慰问品就由他掌管的。我听了很高兴，为爸爸感到荣幸。

在回上海的路上，母亲告诉我，那位长胡子的老人就是沈钧儒老公公，也是被抓进监狱里来的。他们共合七个人，都是救国会的领袖，沈老公公是七个人中年紀最高的，大家公推他是“家长”。“这么大的年紀的老公公也被他们关起来做什么？”我默默地想着……

从那以后，全国为“七君子事件”发宣言，打慰问电，游行示威，纷纷声援营救。也有不少外国名流学者，发表讲话，深表同情。

父亲被关进监狱不久，十二月十二日西安发生了事变，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把不抵抗主义的蒋介石扣起来了。张、杨两将军提出抗日救国和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等八项主张。由于中国共产党出来奔走，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蒋介石被迫答应八项主张后又回到了南京。

蒋介石放出来了，政局缓和。有的人认为，父亲他们出狱有了希望。但是蒋介石回到南京几个月过去了，父亲放回来的消息却渺无音讯，且正相反，国民党却在一九三七年四月，以“危害民国嫌疑”提起了公诉，把“七君子事件”和“西安事变”硬拉在一起，把七个人和共产党联系在一起。这样一来，案情复杂了，罪名更加严重了。

国民党一面以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起诉相威吓，一面又派人进行收买劝降，只要七个人肯写悔过书，交反省院，办个手续就可以“释放”出狱，恢复“自由”。但是七个人的回答是坚决的：救国无罪！没有什么悔过反省之可言。国民党的阴谋没有得逞，于是法院公开审讯了。

六月十一日和二十五日，在国民党法庭上两次公开审讯。第一次审讯开庭前的一小时，法庭外面已站满了家属、亲友和记者。国民党当局害怕了，突然贴出布告：“所有的旁听证一律无效”。这立刻引起人们的愤慨，提出抗议，坚决要求旁听。法庭里七个人也坚决表示，如不公开审讯，决不发言。

斗争的结果终于胜利了。

国民党检察官以七个人“涉有勾结共产党徒，组织非法团体，煽动罢工罢课，扰乱地方秩序，图谋颠覆政府各嫌疑”提起公诉。七君子两次提出答辩状，逐条逐句地加以驳斥。在法庭上，七君子义正辞严，坚定不屈，和检查官、审判官展开了面对面的说理斗争。审判长问：“抗日救国不是共产党的口号吗？”

“那么你同意共产党抗日统一的口号了？”

“我想抗日统一当然是人人所同意的。如果因为共产党要抗日，我们就需要说不抗日，共产党说统一，我们就需要说不统一吗？”

“你知道你们被共产党利用了吗？”

“假使共产党利用我抗日，我甘愿被他们利用，并且不论谁都可以利用我抗日，我都甘愿被他们为抗日而利用。”

当时，七君子领导的全国各界救国会鉴于国难危机日益深重，曾发表宣言要求国内各党派团结一致，集中力量联合抗日。但是一党专政的国民党政府，反对抗日，更听不得各派联合抗日。审判官一再追问“你们讲各党派是什么意思？”妄图从这里追出一条“勾结共党，预谋叛国”的罪状来。

父亲当即答道：“我们讲的各党各派包括国民党、共产党等等。”父亲从容不迫地说：“要知道民族危机已经超过党的利益，所以为国家着想，大家应该团结一致，我们以民众立场要求各党各派团结。”

审判官继续追问：“你们主张联苏容共，建立统一政权吗？”父亲反问审判官：“十三年中山先生主张容共，实行容共，中山先生错了吗？”然后肯定地说：“并没有错，何

况我们是主张停止内战，联合各党各派，目的在集中国力对付日本。而联合各党各派，是‘九·一八’以后国难会议以来上下的共同主张。”

审判官无理取闹地提问，竟把全国各界救国会通电张学良，支援绥远抗日诬蔑为“勾结叛徒，引起西安事变”；把工人、学生为要求抗日救亡受到政府压制而罢工罢课诬蔑是他们煽动的等等，因而激起了被告们的愤怒。

自愿为爱国者作辩护的律师们再也忍不住了，纷纷站起来，仗义执言，痛斥检察官：“检察官侦查四月之久，起诉书完全错了。”“检察官是代表国家的，我们尤其要请你代表国家的人格。”

检察官气急败坏地指着律师说：“你叫什么名字？请书记官记入笔录，将依法起诉。”“什么叫代表国家人格，请记入笔录，我要检举。”律师们全体起立，要求书记官把检察官以“记入笔录”、“起诉”、“检举”相威胁的话也记入笔录。法庭上短兵相接，爱国者理正辞严，弄得检察官瞠目结舌，狼狈不堪。

在法庭外面，广大人民群众抗议、声援、请愿、示威；旅居国外华侨为营救抗日救国的七君子发表《告海外同胞书》。中国共产党发出正义号召，要求政府立即抗日，释放一切政治犯。宋庆龄、何香凝、胡愈之等知名人士十余人，联名具状向苏州高等法院自请收押，愿与沈钧儒等并案办理。他们具状申请“过去与沈钧儒等共同从事救国工作，爱国如竟有罪，则具状人等皆在应与沈钧儒等同受制裁之列。……同负因奔走救国而发生责任，为特联名状，束身待质。”要求法院“羁押审讯”。最后更明确表示“爱国无

罪，则与沈鈞儒等同享自由；爱国有罪，则与沈鈞儒等同受处罚。”他们并亲赴苏州要求高等法院羈押，并案处理。一时救国入狱运动风起云涌，各界人士纷纷响应，发表救国入狱运动宣言，声势浩大，国民党政府完全陷于被动，无法应付。

法院上斗争胜利的消息很快地就传开了，父亲的朋友们奔走相告。但是沈鈞儒老先生深感在国民党法庭上斗争的胜利不等于抗日战场上的胜利，他仍身陷囹圄，对国难日急感慨万端。他在第一次审讯退庭后提笔写了一首诗：

六月十二日退庭，有谓我等胜利者，痛伤久之，答以此诗。

我不要这种胜利！

眼看着地图变了颜色；

六千万同胞沦亡在深渊之底，

我们如果还有一些人气，

那里有心思来与自家人斗鼠牙，争虫臂！

我早已忘掉了我自己。

我所祷着这一天：

能把我的血，飞洒到关外数千里与天无际的白云上，

把我们的骨，深埋在那一边的土里，

这才是我们的胜利！

也就是我们民族的胜利！国家的胜利！

我再不要其他的胜利！

这首诗是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我从沈老先生的诗集《寥寥集》里看到的。当时父亲给我讲述沈老先生写这首诗时的心情和背景。他说他们当时的主张是：“兄弟阋于墙，外

御其侮”。就是说为了挽救民族危亡，愿消除成见一致对外，还把国民党看成是“自家人”。但是国民党却坚持他的“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把一片赤诚的爱国志士看成是制造“内乱”的罪人。当时父亲对我们指出：这是两条根本不同的道路：一条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共产党主张的团结各党各派一致抗日救亡的道路；另一条是对外不抵抗主义，对内是消灭共产党，镇压人民的国民党所走的卖国投降的道路。父亲说他们七个人没有一个是共产党，但是拥护共产党的主张，愿意站在共产党一边的。他有一句话至今我记忆犹新。他说：“国民党把共产党说成是‘背面獠牙’、‘丧尽天良’的怪物，我看共产党才有一颗真正爱国爱民的良心。”最后他还补充了一句：“就是国民党里也还有不少有爱国心的中国人。”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抗日战争爆发了！父亲他们梦寐以求的一天终于到来。在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的强大压力下，蒋介石被迫宣布全面抗战。不久，七君子也被释放出狱，恢复了自由。

七月三十一日那天，七君子走出狱门时，各界早就闻讯而来，欢迎的群众热烈欢呼，口号声、爆竹声高入云霄。

“家长”沈老先生代表其他六个人向大家表示：“可以告慰于大家的是，我们出狱与入狱时一样，主张没有变更。”并向大家保证“我们决不改变我们的宗旨，决定和过去一样，站在民族解放的最前线。”

二 較場口血案

父亲出狱以后，他很快就离开了上海，奔赴山西、武

汉、延安，以及华北敌后，从事抗日救亡的宣传教育工作。当时，云南在滇越、滇缅两条国际通道打通以后，成了抗战的大后方。龙云在云南的地方势力相当强大，和蒋介石的中央存在着各种矛盾，因而有利于民主事业的开展。父亲有鉴于此，便于一九四一年秋天和母亲从重庆先去云南。到了一九四三年春天才把我们全家接到昆明，生活暂时稳定下来。

父亲是从事社会教育的，十分关心社会青年的学习和出路。他到昆明不久，便组织起青年读书会、时事问题讨论会、出版壁报和油印刊物，并在青年群众中经常作公开演讲。他很了解青年们，特别是职业青年们的思想和苦闷，他决心为他们做些有益的工作。

一九四二年底，他在一些出版界的朋友们的支援下，创办了“北门书屋”。经营了一年多，又扩充为“北门出版社”。组织一个编委会，编印了一些青年读物和书刊，为大后方文化教育事业服务。

一九四四年中国民主同盟在昆明成立云南省支部，负责人大都是知识分子和知名教授。父亲就在这时参加了民主同盟，被选为省支部的执行委员。

抗战进入第七个年头。湘桂战区节节后退，西南大后方也岌岌可危。昆明青年、知识界、教育界在“保卫大西南”的口号下，要求国民党政府团结抗战，坚决反对分裂投降。一九四四年的“双十节”，十二月二十五日的云南护国纪念日，昆明各界人士召开了纪念大会，会后并举行了盛大游行。父亲参加了这两次大会，并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从那时起，昆明的民主运动逐渐掀起了高潮。

“八·一五”抗战胜利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

来，举城欢腾，群众自动上街庆祝，到处是鞭炮锣鼓齐鸣。从“九·一八到“八·一五”十五年来，父亲呼喊抗战救亡，看到了这个场面，他怎能不高兴呢！他也跑上街头，和群众一起欢乐，共同庆祝。但是，他入夜沉思，深感抗战虽已胜利，而民主还没有到手，他立即提笔写了一首新诗，题目是《不要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在一次诗歌朗诵会上，朗诵了他的诗，他要大家时刻保持着清醒、冷静的头脑。

十月一日，民盟在重庆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父亲赴渝参加。会上父亲被选为民盟中央委员。会后，他留在重庆，和陶行知先生共同从事社会教育工作。在重庆职业青年的发动和支持下，创办了一所“社会大学”。

抗战胜利后，百废待兴，全国人民多么渴望和平。毛主席带着亿万人民的心愿，在日本投降后的十三天——八月二十八日，毅然飞到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毛主席在重庆住了四十三天，接触了各方面人士，鼓舞和扩大了全国的民主力量。毛主席与蒋介石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签定了《双十协定》。

一九四六年一月，政治协商会议开幕了，会议给全国人民带来和平、民主、团结的新希望。

二月十日，重庆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闭幕，在较场口召开万人大会。父亲是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并被推选为大会总指挥。会议刚开始，一个自称是农会代表的刘野樵上台抢占播音器，父亲和其他主席团成员上前制止，立即有一伙暴徒跳上台来行凶动武，大打出手，把父亲和郭沫若、马寅初，施复亮等先生从台上打到台下。在场的青年挺身而出和暴徒们展开斗争，一部分青年把他们救出重围。父亲

的头已被铁器打破了，郭老和施复亮先生也都被打伤，鲜血遍洒在台上台下。群众愤怒了，当场揪住一个凶手，从他身上搜出一封重庆卫戍区司令稽查处的信件，信上指示他们要提前到场见机行事，并附有法币五十万元。证据确凿，群众一目了然。

周恩来总理当时是中国共产党参加政协会议的首席代表，闻讯后立即赶到会场。他看到这种情况非常气愤，奋不顾身上前制止，并叫人用他自己的汽车把父亲送到市民医院抢救。后来，周总理赶到市民医院探望伤者，父亲忍着极大的伤痛对周总理说：“为了和平民主，为了祖国的统一，我受点伤算不了什么，我要更加坚强起来，力争人权、自由和民主！”

政协决议的墨迹未干，就被蒋介石撕得粉碎。他自以为内战的准备已经就绪，就背信弃义地向解放区大举进攻。周总理率领中共代表团五月初飞南京，许多进步教授、作家、爱国民主人士也相继离开重庆。父亲伤已痊愈，五月初也回到昆明。他在和陶行知先生临别时，两人相约，将来回到上海、北平一定要继续创办社会大学，为民主教育事业贡献终身。

三 李闻惨案

一九四六年五月初，父亲回到昆明不久，很快就有一阵阴风向父亲和闻一多伯伯扑来。昆明市中心的近日楼，一直是进步势力占领的宣传阵地。自从五月初，清华、北大、南开三个大学组成的西南联大，决定复员北平、天津，一批的学生相继离开了昆明。一时反革命气焰非常嚣张。那几天近